

全球化对欧洲合作主义福利国家的挑战

郑秉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教授 副所长

内容提要 以国家、雇主组织和雇员工会三方合作为主要特征的、以北欧一些国家为典型代表的欧洲合作主义（corporatism）福利国家，在 80 年代受到了新保守主义政制（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的洗礼和冲击，但在 90 年代又出现了回潮迹象；可是今天，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合作主义福利政制又一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强资本”与“弱劳工”将会同时成为全球化的伴随物而突现在福利国家之中：一、工会组织率和集体谈判覆盖率的日益下降导致工会组织的合法性及其存在意义受到挑战。二、工会组织的弱化导致其谈判能力的下降，谈判层次具有向下移动的趋势。三、在国家、资本和劳工三者之间，权力的平衡开始向资本一方移动，三方伙伴主义的关系基础具有弱化的倾向。四、全球化将产生削减政府赤字和降低税收的外部压力，由此对社会福利和社会开支水平产生“下调”的倾向。与此同时，全球化将导致工会作用的反弹，使之成为支撑合作主义政制的重要力量之一：一、各工会之间开始采取联合行动要求政府提高福利待遇。二、“工会合并”现象日益频繁。三、公共部门工会采取行动的作用和效果要远远大于私人部门工会。四、在欧洲“减税风”中亦可看到工会发挥的作用。五、欧元将会成为一个间接地强化合作主义政制的因素。六、全欧性的“制度性对话”具有分散和弱化民族国家内三方伙伴架构的合作主义因素的可能性。

关键词 全球化 合作主义 福利国家 挑战

英文标题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to the Corporatist Welfare Regimes in Europe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以来，许多欧洲国家在经过了撒切尔新自由主义的洗礼以后社会合作主义（corporatism）又出现了回潮：爱尔兰 1987 年 - 1993 年之间连续签署了三个社会经济契约；西班牙 1992 年和 1994 年分别签署了两项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西班牙 1987 年至 1992 年之间签署了一系列相关内容的契约；葡萄牙于 1987 年至 1992 年间在全国范围内与工、商、农等协会正式达成协约；比利时 1991 年至 1993 年恢复了 70 年代中断的契约行动，就社会福利等有关内容签署了一系列全国性的契约；意大利 1992 年 - 1995 年间签署了三个契约以此作为其福利制度改革的重要标志；荷兰于 1982 年和 1993 年分别签署了两个社会契约；等等

上述欧洲国家签署的社会契约向世人昭示，如果说欧洲合作主义思潮与政制（régime）在 1973 年发生石油危机时遇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挑战，随之在整个 70 年代处于低潮的话，那么，整个 80 年代新保守主义的崛起就无疑致使合作主义达到最低点。80 年代以英、美为首的保守主义政制掀起的收缩社会福利规模的改革浪潮在其它欧洲国家产生了广泛的示范效应，从而推动了它们各自福利改革的进程。就象瑞典和奥地利等合作主义政制在 80 年代“右”转的过程中面对来自“左”派“捍卫福利国家”的抵触甚至抗议从而导致改革受挫甚至夭折那样，上述欧洲福利

国家纷纷从 90 年代开始重温“社会契约”的旧梦显然是合作主义开始回潮的一个佐证。西方舆论给予了这样的评论：“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工会参与了社会对话，由于进行了这几次对话，限制工资水平和创造就业机会才取得平衡”（英国《金融时报》，2001 年 3 月 9 日）。

合作主义在欧洲工业化国家出现了回潮的苗头，甚至波及到了东欧一些转型国家，这说明了合作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思潮，还是一种制度工具，甚或一种政制，都有一定的存在空间。“道路依赖”也好，“制度惯性”也罢，无疑都可作为解释其原因的重要答案之一；“福利刚性”也好，政党工会的压力也罢，显然都是推动合作主义政制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米什拉（R.Mishra）对福利国家“不可逆转（irreversibility thesis）”的论点做出了 8 个方面具有独到见解的评论¹，但是，他并未对“福利国家在短期内是不可逆的，但声称福利国家在长期也不可逆就必须要有另一种不同的推理”的看法提出异议；虽然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资本与劳工、政府与选民等等这些两分法模式的分析前提被认为有些过于简单化，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互动关系在可预见到的未来肯定将会成为社会冲突中重要角色的对立统一而不可替代；虽然“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功能性必然伴随物”这样的看法至少在合作主义的频谱仪中很难得到案例上的支持，但是，除非类似 1973 年石油危机或 1929 年大危机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否则，70 - 80 年代的新保守主义并没有根本触动福利社会的制度基础。至于米什拉提到的“成熟论（maturity thesis）”，不管它是否指目前社会支出和社会公益的现有水平似乎应该代表着在可预见到的未来人们预期的上限，至少，“制度创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对福利制度的指责不外乎还是在社会支出的“度”与“量”、社会覆盖的“小”与“大”、社会责任的“多”与“寡”等几个特定“成熟”的框架之内而或是呼喊“狼来了”或是我行我素，人们始终没有摆脱在“适应性”和“灵活性”之间寻找均衡点的制度框架结构。事实上，米什拉提到的“社会福利多少意味着稳定”这个观点多少已在欧洲国家走马灯式的政党竞选时抛出的纲领性承诺与竞选获胜后的“食言”行为之间的巨大反差所予以印证。

一， 全球化对欧洲合作主义政制的影响

虽然欧洲合作主义经受住了 70 年代经济危机和 80 年代新保守主义冲击的“考验”，福利制度的大厦“仍完好无损”，“福利国家并没有被新保守主义摧毁”，但是，毕竟它“开始出现裂缝……家俱开始变得陈旧(Ramish Mishra,1990, p.xi.)”。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上受到了一次洗礼之后，关于多支柱式的社会保障体系与福利多元主义的讨论结果已经取得共识：社会福利不等同于国家福利，所以，福利国家应该向福利社会转变。于是，在 90 年代合作主义旧梦重温之际亦即在新保守主义政府纷纷下台代之以社会民主党执政之时，“第三条道路”便应运而生；或称，90 年代“第三条道路”的诞生和社会民主党的上台“唤回”了合作主义的“幽灵”。吉登斯认为：“第三条道路”指的是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试图适应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界……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安东尼·吉登斯，2000 年，第 27 页)。由此看来，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既非新保守主义，也非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在总结过去几十年失败的基础上而得出的一套新的

政治经济理论，就是说，它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超越”传统的“左”和“右”的“第三条道路”；其基本政策主张是既反对过度的国家干预，也不赞成否定国家干预，而认为应该给予适度的国家干预；主张政府与公民重建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在大力发展社区建设与社区教育的基础上建立“新型民主国家”；主张既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又重视公共利益，“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没有民主就没有权威”；主张不缩减社会福利，不减少退休金、失业金和医疗费，等等。由此看来，口号多于思想、含糊多于明确、折衷多于个性、拿来多于创新的几乎包罗万象的这些自我表述只不过是合作主义频谱仪两端之间的简单移动而已；既然在西方学者眼里合作主义自身都不是医治资本主义弊病的“万灵丹”（Ramish Mishra, 1990, chapter 5），那么缺乏思想系统性的“第三条道路”型的合作主义也就称不上是什么新“药方”了。在力图总结以往各种政策和理论的经验教训、探索维护资本主义福利制度与经济发 展的“第三条道路”的指导下，欧洲合作主义政制何去何从，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和满足新的社会需求，这里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合作主义政制或多或少总要为满足外部世界变化与客观条件存在的要求而调整自我结构的机理，这一点是确定的。当欧洲迈入 21 世纪门槛的时候，它首先要面对的是全球化的浪潮和欧洲单一货币体系——欧元纸币的发行与流通，它势必对其合作主义福利制度的结构和内涵产生重大影响，对欧洲合作主义政制提出新的挑战，合作主义政制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一），合作主义政制赖以存在的三个重要基石之一的工会组织首先将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合作主义可以简单称为“三方伙伴主义（tripartism）”，许多学者直接将“合作主义”与“三方伙伴主义”等同起来，因为“合作主义”基本上被理解为根据总的国家形势为谋求各种经济和社会目标之间达到平衡状态而在社会（societal）层面上实行的三方伙伴主义；所谓“三方伙伴主义”就是指政府、劳工组织和雇主组织建立起的“社会伙伴关系”，即“合作主义”就是“主要利益集团之间的制度化合作”（Ramish Mishra, 1990, pp. 54, 57-58）。在上述三方伙伴中，合作主义福利制度赖以存在的工会组织将面临着全球化浪潮的极大挑战。

劳动力市场的“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使传统的大集中大生产相对越来越少，网络化和电脑化使工作地点更为分散，工作性质的个性化更为明显，以前那些大批标准而熟练的劳工群体迅速被许多其所属权威和报酬等级含混不清的新群体所替代，传统合作主义政制中某些重要利益纽带越来越松散。外国移民的增加、部分时制和临时时制工人人数的增加等因素使工会组织的活动愈显得困难起来，工会的代表性受到了质疑。劳工组织的配合已不再是大幅提高生产力或引进新技术新工艺的必要条件。劳动力流动性的加强使工会组织日益松散从而使其吸引力下降，工会成员数量开始下降。有些国家的立法条文开始对工会进行排斥，工会组织的合法性及其存在的意义受到了挑战。从历史传统上讲，欧洲工会的组织率和集体谈判覆盖率历来高于日本和美国，以 1997 年为例，芬兰两者的数据分别为 81% 和 95%，瑞典是 91% 和 89%，而美国只有 16% 和 17%（姜列青，2001 年，第 3 期，第 14 页）。但是近年来这些数据均有所下降，例如，英国工会的组织率从 1980 年的 50% 下降到 1994 年的 34%，工人在集体谈判的覆盖率也从 1980 年的 50% 下降至 1993 年的 47%（Hutton, W., 1995. pp. 91-92. King, D.S., 1987, pp. 118-120.）。最新的统

计资料显示，所有中等水平国家中（澳大利亚除外）只有不到 40%的雇员受到集体谈判的覆盖（国际劳工局·日内瓦，2001，第 97 页）。

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工会联合会（欧工联）最近发表了一份欧洲工会现状的评估报告（英国《金融时报》，2001 年 3 月 9 日），得出的结论很不令人乐观。多数西欧国家的工会在面对国际竞争加剧、技术更新、弹性就业增多的全球化形势下没有充分地改进和调整自己，在一些小公司和私营服务行业中，工会甚至越来越难以找到立足点。例如，在西欧国家中，只有瑞典在超过半数的劳动场所设有工会代表，而在德国，这个比率只有 6%；该报告在逐一对法、德、荷、比利时等国家进行考察之后指出，西欧国家工会制度普遍艰难，除非工会能够通过建立值得信赖的工人代表机构等途径再次占领劳动场所，否则，工会的前途难以预测。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马恩-河谷大学教授奥利维耶·施瓦茨十几年来一直对工人状况和劳工界进行跟踪研究，他最近在法国《人道报》撰文说，法国工人运动正在日趋衰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人数已下降至 630 万人，其组成变得广泛庞杂，新一代工人缺乏以往工人阶级的统一性，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缺乏认同感，他们追求的是休闲、音乐、体育、娱乐等文化生活模式，而不是工作。作为与马克思所说的相对应于“自在阶级”的“自为阶级”来说，这个“自为阶级”正在衰落（法国《人道报》，2001 年，5 月 2 日）。

（二），工会组织的弱化导致其谈判能力的下降，从而致使制度性对话被分解，谈判层次开始向下移动

上述工会组织结构的变动带来了工会性质上的一些微妙变化。全国性的行业工会出于阶级立场的要求其性质产生变化，它们在传统集体谈判中发挥过的重要作用受到了打击，有关工资、利益等集中谈判遇到了困难，全国一级的“议合（consensus）”也变得越来越有难度，讨价还价的能力受到了削弱，制度性对话被逐渐分解，国家层次上的谈判议合具有明显和强烈地向下移动的倾向，即“契约议合”下移至行业、部门甚至总厂和总公司的层次上，甚至只发生在个别劳资互动之中。

支持上述判断最好的例证是 2001 年 8 月 28 日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公司与德国五金工会达成的一项被称之为“5000 × 5000”的契约。它最早由大众集团总裁皮希于 2001 年 6 月初正式提出，其基本内容是：大众新建一家制造家用型“微型货车”的工厂，并为此安置 5000 名失业工人。这些工人的月工资不受实际工时影响一律定为 5000 马克。但工人必须定期接受培训，否则就拿不到全额月薪。大众公司的这一新型就业模式在两个半月前与工会的谈判中遭到了拒绝。

大众公司的最初方案是，工人每周的劳动时间为 42.5 个小时，其中 35 个小时在流水线工作，7.5 个小时接受培训。但工会方面提出，大众公司目前的劳资合同规定，工人每周的劳动时间不得超过 35 小时，订单过少时甚至可以减至 28 个小时，当然工资也将相应降低。而新方案规划的每周工作时间却超过了 40 个小时，这损害了工人利益。此后，有关这一就业模式的争论在德国一直不断。工会担心，这种就业模式将会对现有的劳资合同形成挑战，可能导致出现同工种但不同收入甚至低收入的情况。另外，一旦这种模式得到普及，势必将会逐渐降低工人的整体工资水平。在政界的干预下，大众公司和五金工会于 2001 年 8 月 27 日再度就此进行

谈判。经过了 16 个小时的艰苦磋商，双方终于在 28 日上午就大众的新型就业模式达成了一致。这种就业模式的有效期暂定 3 年半。

据大众公司透露，这种新的就业模式确实使工人的实际收入较以往有所降低。如今大众公司工人的月工资为 4500 马克，奖金至少 500 马克，而加班费，尤其是节假日或非工作时间的加班费另算，其小时工资往往是正常工作时间小时工资的一倍甚至几倍。但在新的就业模式下，至少工人正式上岗后的第一年，除每月平均可能拿到 4958 马克的工资外，几乎没有其它收入。虽然经过政府出面斡旋劳资双方最终达成“议合”，社会各方对此反应还算比较积极，甚至称赞“这种就业模式为解决失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施罗德总理还呼吁“其它企业和工会依照其榜样，提出类似有创建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毋庸讳言，工人的实际小时收入低于企业中的同行，每周工作时间增加了；虽然“这是一种值得效法的劳资模式”，被认为是它们在解决失业的斗争中共同迈出的重要一步，5000 马克高于现有的失业金水平，但是，事实上工会讨价还价的能力降低了，国家层次上的谈判议合已开始向下移动，工会在社会谈判中正逐渐处于劣势，而资本正逐渐走向优势²。

工会一直被认为是欧洲合作主义福利国家的基石之一，上述变化趋势将“别有一番含义”，并且，“非工会化是一种世界现象”，已经波及到了许多国家。迈克尔·阿尔贝尔(M. Albert)认为，即使在瑞典，非工会化现象也十分严重，强大的中央工会“瑞典总工会”(LO)也遭到了削弱，集体谈判程序开始分散化，全国一级的谈判已经降到企业一级了(米·阿尔贝尔，1999 年，第 155 页)。

(三)，在国家、资本和劳动力三者之间，三方权力的平衡开始向资本一方移动，合作主义和三方伙伴主义的关系基础倾向于弱化

全球化的深入加强了资本与国家谈判关系中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提高了其迫使国家减税、取消管制和降低成本(如降低工资水平和福利水平)的要挟能力；相反，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劳工利益为代价的劳工与资本抗衡能力的削弱，于是，“强资本”与“弱劳工”就会同时成为全球化的伴随物而突现在福利国家之中，合作主义政制将面临着新的考验。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雇主、雇员和政府可以对各种各样的经济交易讨价还价，这种状态因经济的开放而被破坏。因此，组织起来的劳动者只能选择折衷的工资，接受新的技术和工作程序，以换取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如果政府放弃提供充分就业的承诺，那么，资本也不那么需要劳动者的合作。由于失业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劳动者将服从于市场机制。因此，在象瑞典那样的国家里，社会福利的合作关系和三方关系即使没有被破坏，也已经被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象德国、奥地利和挪威等国家，新合作主义的机制仍在运行。尽管从结构的角度来看，资本相对于劳动力和政府处于强势地位，但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影响了社会福利合作关系的安排以及它的持续性(Garrett, G., 1998, Chapter 6.)。

假设其他的条件都不变，公司的集中化程度就是影响资本从社会福利合作机制撤出的重要变量。譬如，众所周知，瑞典资本比挪威资本更国际化、更集中化，也许这就可以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在社会福利合作方面如此不同。经济状况是另一重要变量。全球化给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权利分配带来的是结构性的变化。

（四），全球化将产生削减政府赤字和降低税收的外部压力，由此对社会福利和社会开支水平产生“下调”的倾向；而与此同时，面对福利政策目标的“向下移动”，合作主义倾向将会出现反弹，要求维持甚至不断提高其福利水平

随着国民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资本和金融流动性、灵活的利率以及金融市场的支配地位等因素的不断增加将会大大加强企业家的“控制力”，它们对各国的税收政策将产生“下调”的外部压力；非政府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如经合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等等）、企业雇主和公司文化的发展将会导致降低税率的呼声愈发强烈，进而推动低税收政策在全球开始蔓延。欧洲国家近年来刮起的一股“减税”风就是明证。例如，德国早在 1994 年就提出了税收改革设想，2000 年终于通过了税收改革方案，计划在 2001 年至 2005 年期间分 3 个阶段实施，减税总额可达到 900 亿马克（裘元伦，2000 年 9 月 20 日，第 8 版）。再例如，法国计划从 2001 年至 2003 年期间减税 1200 亿法郎，这个减税计划被认为是法国 10 年来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³。减税的结果将为各国政府带来了削减社会福利水平和社会支出的压力和借口，加之诸如经合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的卷入，势必对其成员国的社会福利政策也将产生向下调整的压力，它们希望其成员国的社会福利供给具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和弹性。由此看来，全球化的浪潮对社会福利与社会支出的影响将会产生 2 个方向相反的压力倾向：一方面，由于国际组织的卷入和减税政策取向等原因而导致的社会福利制度向下调整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工资水平的停滞或不断下降、人口的老龄化和单亲家庭的增加等因素，社会支出的需求将变得有增无减，即劳动市场管制的放松等相对灵活的社会就业政策将会增加对制度化社会保障项目的需求，从而产生推动社会支出和社会福利向上移动的压力。来自于全球化的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压力虽然对国家福利政策的影响是间接的，但它却是长期的；虽然民族国家在财政和社会福利政策方面仍然是自主的，但它不得不考虑来自于国际的（如国际组织）和国内的各种主张维持和“捍卫”福利国家和阻止削减社会福利因素的存在（如公共的选择、选举政治、利益集团以及人口结构等等），甚至在某些时候和场合由于害怕出现政治上的反弹而放弃某些领域的社会支出紧缩政策，出现福利扩张的可能性。例如，近年来法国将近 10 个福利项目标准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上调，并且又设立了一些新的福利项目⁴。

二，为捍卫福利国家，工会的反弹将成为支撑合作主义政制的重要力量之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洲国家新保守主义的下野虽然使福利国家“收缩派”的势力得以“收缩”，但同时“维持派”也受到了重创，合作主义政制相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面临全球化的冲击，“三方伙伴主义”的发展将具有弱化的趋向；可是，另一方面，福利国家受到的“触动”和福利多元化的趋势以及全球化为合作主义带来的困难又一定程度地导致了工会组织的反弹，出现了工会力量联合的趋势和维护与推动国家福利制度不断发展和膨胀的可能性。欧洲国家的这些历史积淀和传统或许就是欧洲合作主义政制存在的根本原因之一和 20 世纪 90 年代“第三条道路”理论产生与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之一，或许，是欧洲合作主义“回头”与“第三条道路”型的合作主义的重要特征和表现。

（一），为加强工会的谈判力量，近年来欧洲国家各工会之间采取联合行动要求政府提高福利待遇的事情时有发生

法国公立部门七大工会（劳工总联合会、劳工民主联合会、工人力量总工会、全国自治工会联盟、统一教师工会、天主教工人联合会和企业行政及技术人员总工会）联合号召全国 540 万公务员于 2001 年 3 月 22 日举行了全国大罢工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在明显改善的基础上”重新展开工资谈判；工会与政府之间的主要分歧是如何提高 2000 年用以计算工资和退休金的基数，在失业金和退休金等其它问题上也有不少分歧。工会方面认为，国家与劳资双方的关系是“社会重建”的中心主题，应尽快予以解决；而政府方面表示只能在市镇选举后对工资问题做出决定。再例如，法国就业部 2000 年 11 月 17 日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领薪者月工资指数（SMB）在 1999 年 9 月至 2000 年 9 月的一年时间之内增长了 1.9%，而物价指数却上涨了 2.1%。同时，欧洲经济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欧元区由于石油价格上涨等因素，以过去 12 个月来统计，2001 年 2 月份物价上涨 2.6%，1 月份为 2.4%，涨幅大大超出欧洲中央银行确定的 2%的“红线”。根据这些官方统计的“工资低于物价涨幅”的“铁的事实”，法国七大工会联合发出呼吁，号召在 2001 年 3 月 22 日参加“全国罢工和示威日”。这七个工会在它们递交政府的最后通牒逾期后，联合签署了一份公报，表示：“鉴于公共事务部长坚持不愿意在进一步改善的条件基础上重开工资问题谈判，工会因而号召于 3 月 22 日再一次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罢工和示威日活动”。工会方面提出的具体要求是提高工资 1.1%，而政府只同意给 0.5%。再例如，2001 年 3 月初以来，法国几家医疗行业的工会组织向政府提出了增加医务管理干部及泛医分支工作人员的工资，这项要求若获政府批准，在未来的 5 年里将使国家每年增加 22 亿法郎的额外支出⁵。

（二），欧洲国家的工会不但在对付政府采取行动时经常联合起来统一步调，而且近年来“工会合并”的现象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份报告，英国运输工人和普通工人联合会已发展成为一个巨人组织，在各个经济分支以及在服务部门都拥有会员。英国两个最大的有色金属工人联合会、工程电力工会和制造业科学金融业工会又进行了一次大合并。国际工会联合会呼吁各工会组织要提高效率，加快合并进程，以寻找可以与国际资本势力相匹敌的组织形式。组织的不断合并和重新组合使其势力开始膨胀，成为抗衡国际资本的一个有力武器。在过去的 10 年中，工会的合并和集中化在德国了发生了新的变化。建筑工会、矿业工会、化工造纸和陶瓷业工会已经完成了合并，林业工会和纺织工业工会等一些规模较小的工会被有色金属行业工会所吸纳。

令世人震惊的还属德国最近的一次合并行动。经过 3 年的艰苦谈判，2001 年 3 月 16 日德国公共服务和运输工会、邮递员工会、传媒工会、职工工会和商业、银行和保险业工会等服务行业五大工会终于决定进行大联合，组成名为“服务行业统一工会”（Verdi）的新工会。它将是此行业中全球最大的工会组织。这个工会巨人的首要目标是在日益扩大的服务行业吸收新会员，以弥补近年来工会会员的流失。合并后的 Verdi 虽然目前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工会，拥有 299 万会员，但与 1996 年时的 343 万人相比，还是流失了 40 多万个会员。国际劳工组织的这个报告表明，虽然合并和集中化的进程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在一些国家，

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上的分歧依然是阻碍工会合并的主要因素（《劳工世界》，第 6 - 7 页）。

（三），欧洲工会运动传统中一个重要特点是公共部门或国营企业的工会采取行动的作用和效果要远远大于私人部门或私营企业工会组织所采取的行动

近二十多年来，全国性规模的大罢工越来越多，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有不少甚至可以称作是“历史性的”；其结果是公营部门工作人员待遇显著改善。根据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公营部门的平均收入高于私营部门，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尤其在有关退休和工作年限上，而服务质量的改善则远远落在后头。公共部门似乎从罢工中尝到了“甜头”，举行示威和罢工的次数愈来愈多，密度愈来愈紧，规模愈来愈大。比较起来，私营部门的罢工效果“不太理想”。这里有很多原因，但归根结底恐怕还在于这两大部门根本性质的区别：公营部门通常掌握着国家的命脉，而且被借故解雇的可能性比较小；私营部门则没有这些特点。因此，并非私营部门职工不想采取一切手段改善自身的境遇，只是受制于自身处境的限制而已。政府在推行削减福利计划时，往往首先在或只能在私人部门进行，而公营部门一般来说则始终处于不败之地。出于保住自身“铁饭碗”利益的考虑，公共部门的工会对私有化运动基本上是采取消极和抵制态度的。2001 年 3 月 6 日，法国的五大工会（劳工总联合会、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工人力量总工会、企业行政及技术人员总工会和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号召会员举行“全国行动日”，目的是“对公立部门私有化以及打破规章说不”⁶。

（四），在欧洲“减税风”中亦可看到工会发挥的作用

例如，法国宣布从 2001 年起将取消“居住税”中所含的地方税部分。政府的这个举措源于法国“全国税务统一工会”2000 年 11 月 6 日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工会发布了一份资料详尽的统计报告，指出，由于地方分权的原因，居住税中的地方税部分在法国各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导致了“实际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即各地区实行的税率不尽相同：大巴黎地区的税率是 0.978%，阿尔萨斯（Alsace）是 1.51%，布列塔尼地区（Bretagne）是 2.03%，上诺曼底省是 2.38%。这个报告对政府下决心取消“居住税”中所含的地方税部分起了重要作用⁷。

三．欧洲一体化进程对合作主义政制的影响

斯密特和哥诺特(P. Schmitter, R. Grote)曾预言，对于欧洲的合作主义来说，“如果前面 20 - 25 年周期的推测正确，如果把它上一次的衰落确定为 1973 年的石油危机，那么在 1985 - 1988 年它达到最低点，1998 - 1999 年之后将再次达到顶峰，这差不多正好是预计中欧洲货币统一的时候”（P.C.斯密特，J.R.哥诺特：1998 年，第 187 页）。也就是说，欧洲单一货币体系欧元运行之际应是预计中的欧洲合作主义回头之时。不管这个预测在现实中是否应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元的启动对欧洲合作主义政制将产生较大的影响。

（一），从失业率这个间接的角度看，欧元的诞生将会成为一个间接地强化合作主义政制的因素

区域金融一体化和货币单一化将对民族国家中央银行改变国内信用条件的能力产生限制性的约束，外部压力将会对国内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产生抑制的倾向，其

结果将会使其成员国纷纷采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代之以积极的货币政策 (Tabb, William A., 1989, No.5, October.)。反过来说,在区域性紧缩经济政策的环境中,单个国家若反其道而行之采取积极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是难以成功的,1981-83年法国密特朗计划的夭折就是明证。此外,德国前财政部长于1999年3月辞职的事例也可以作为一个最新的佐证⁸。与其它OECD国家相比,近几十年来西欧成员国的经济政策总的来说采取的是紧缩的立场,这似乎是西欧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由此而为欧洲经济带来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欧洲主要国家都几乎平均是两位数,高于北美和日本。当然了,这与该时期新保守主义思潮泛滥及其政策理念流行绝对不无关系,但是,在“华盛顿共识”深入人心的欧洲,赋予失业率和经济增长以较低的权数而力图保持财政平衡、物价稳定和汇率平稳则更为人们所接受。尤其是,80年代后期货币一体化的步伐加快、90年代单一货币过渡期3个阶段的时间设定,终将欧元区紧缩性经济被“固定”下来。这样,高失业率就将会成为一种“常态”而伴随着欧元纸币的诞生而进入21世纪⁹。

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马斯特里赫特所确定的货币同盟趋同标准“实际上是对所有参加国的福利国家的一场大围剿”,因为它“强迫各国削减社会开支,敦促公共财产实行私有化,还普遍地造成一种有利于大公司利益的氛围”,其结果“是使各国无力推行独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法支持传统的福利措施”,这就要求“欧洲的工会组织也在努力实现跨国合作,以保护全欧盟的工人利益。”(舒尔茨, B·H. (2001), 第53页)。之所以说失业率居高不下被欧元单一货币体系相对“固定”下来是间接强化欧洲合作主义政制的一个因素,是因为从长期来看它为欧洲各国工会的活动留下了较大的活动空间,工会的代表性和存在的意义在“为实现充分就业而斗争”的现实中和与国家和雇主的谈判中充分体现出来并由此将继续成为欧洲工人运动的主角。

(二), 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将会推进全欧性的“制度性对话”

一方面,欧盟凌驾于各成员国之上,制定一些约束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取消一些不利于单一市场发展的具有民族国家的制度,使福利国家的发展出现了外化于民族国家社会功能领域的现象¹⁰;另一方面,关于社会福利的“集体谈判”也出现了若干超国家的全欧性机制,从而使欧洲国家的劳动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1999年3月欧洲联盟各国签订了限制延长劳动合同、反对缩减劳动者社会保障水平的相关协议,在农业和食品加工等领域也签署了类似的协议。

全欧性的“制度性对话”机制的出现如同欧盟成员国其它领域部分主权让渡那样,无疑它标志着在国家一级的“谈判议合”之外又出现了超国家的“合作主义”因素,这是一个崭新的历史现象。这种“向上移动”的因素对于民族国家的合作主义政制来说是具有强化的还是弱化的作用呢?它对欧洲的福利制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扩张性的还是收缩性的?

毫无疑问,对前者来说,合作主义“潜力”的“向外漫延”说明了三方伙伴主义中工会力量由民族国家内部“向外部释放”的可能性,从而具有分散和弱化民族国家内三方伙伴架构的合作主义因素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欧盟层面的“制度性对话”的约束力和涉及的领域毕竟是有限的,并且,欧盟与各成员国之间的协调解决毕竟最终是“全欧性对话”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对于后者来说,由于全欧性

的集体谈判多发生于跨国行业系统里，所以，三方伙伴主义的“向外漫延”对于民族国家的福利制度将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压力释放”的结果将具有导致福利水平向下的趋势。在“欧洲企业”（即欧洲跨国公司）里，“强资本与弱劳工”的差异比其它企业更明显，工会的组织率与集体谈判覆盖率还要低，例如，根据欧洲议会的有关法案，“欧洲企业”里要建立工人委员会以保护工人的利益。但到1998年底，在1300个“欧洲企业”中只有450个建立了这样的委员会，并且，这个趋势正在减缓。按规定，旨在工人参加管理的工人委员会体制只在“较大”的“欧洲企业”里实行，但这些“较大”的企业只占全部“欧洲企业”的3%，而工人却占全部总数的50%（姜列青，第15页）。基于上述数据，“欧洲企业”中工会的讨价还价能力和所接受的条件都将是较低水平的，与其它企业相比将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以推断，全欧的“制度性谈判”对民族国家的社会支出与福利制度至少目前来看不会产生扩张性的作用。

（三），欧盟内部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会导致其成员国税收、收入再分配和企业年金以及企业内部集体谈判制度等方面的变化

欧盟内部资本流动性的提高将导致对劳动力需求弹性的提高，各国之间更容易彼此替换劳动力，这样，税务负担就容易从流动的资产所有者（投资者）转向不流动的资产所有者（劳动力）身上。80年代以来，法、德、英等国的资本的平均税率始终呈下降趋势，而劳动力的税率则在不断上升，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政府在资本和劳动这两方面总开支的相对负担，就会出现纳税阻力，削弱国民的各种福利待遇水平，从而削弱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作用，为此曾有人建议创立一些国际税种¹¹，以弥补国际贫困的差距。劳动力流动的规模越大，要求减少成员国之间福利待遇差距的压力就越大，调整劳动力在不同成员国拥有津贴权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构以维持其收入再分配的性质就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

此外，欧盟内部生产要素的流动不仅对其成员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影响，对企业补充保险既企业年金制度也有一定的影响。据悉，“有些大公司正在施加压力，要求进一步规范企业年金的准则，尤其是在各国税收方面的待遇以及对年金基金投资方面的限制，因为这些公司雇佣了来自不同欧盟成员国的雇员并在各国实际拥有各自单独的公司年金基金（国际劳工局·日内瓦（2001），第45-47页）。”企业年金的变动必然涉及到企业内部集体谈判制度的架构和工会地位的问题。

¹¹ Ramish Mishra: *The Welfar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0, p.104.

在米什拉教授的这本书中，他罗列了学界关于福利国家的三种观点：**不可逆转的观点，成熟性的观点，福利多元主义的观点**。针对第一个观点即福利国家“不可逆转”，他从8个方面做了分析评论：（1）、可逆转/不可逆转的两分法模式不能公正而适当地评判和对待新保守主义政制下福利国家局部发生的变化和局部出现的颠覆。（2）、认为这个观点不能抓住社会变革的特征，特别是从个人生活机会和不公正的角度来看就更是如此。（3）、在这个观点中，维持“充分就业”并未被看作是社会合作主义政权所奉行的政策特征的一部分。（4）、它忽视了财政政策对贫困和国家福利的前途产生的影响。（5）、它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物质的和制度的方面，即集中在社会项目和社会支出的变化上，而客观上忽略了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变化。（6）、这个观点在考察社会变迁时极少考虑到暂时的变化。（7）、它基本上没有从动态的视角观察福利国家的变革，例如收入分配的冲突等。（8）、关于“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功能性必然伴随物”这个观点，他认为在这里隐含着重要的时间跨度问题，即从公共提供服务转向功能性替代品时涉及到**时差即时间上滞后的**问题，例如从国家养老金转向企业年金。这样，社会福利的功能就使得社会福利项目在短期内变成事实上的必然伴随物，因此，它们就不能在一夜之间被废除掉。

总之，米什拉教授认为，“不可逆转”的理论没能公正评价福利国家 70 年代中期以来所经历的许多重要变化。然而，这一论点还是有用的，即由于国家福利设施表现出的累积和合法化的各种功能、相关的既得利益、选举竞争和民主制度等因素，资本主义的这些福利设施不可能被全部废除，在短期内则肯定不会被废除。

² 关于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公司这个“5000×5000”议合方案的上述资料引自《德国大众创造全新就业模式》，载于《经济参考报》，2001年8月31日，第3版。

³ 关于法国减税的资料，请参见郑秉文（1）、（5）。去年以来，从克林顿到施罗德，从伦敦到马德里，在欧美国家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减税风”。法国政府这次减税的重点在个人、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不但调低了个人所得税纳税标准，还取消了个人汽车印花税；不但降低了企业税税率，还削减甚至取消了低收入阶层的某些税赋。法国这次强劲的“减税风”，就涉及到个人福利方面来看，主要有 2 个特点：一，低收入家庭的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较大，减税较多。二，为缩小福利差距和稳定社会，对高收入家庭进行“惩罚”。

⁴ 关于法国近年来增加福利项目和提高福利标准的详细情况，请参见郑秉文（2）、（3）、（4）。就法国的情况看，近年来政府在津贴和补助金发放方面呈现出两个特点。一、**设立新的津贴和福利项目。**（1）为丧失自理能力的老人设立了“自立补助金”。（2）“家长照看孩子补助金”是专门为孩子生重病、天灾人祸或伤残儿童的父母设立的。（3）立法规定城市必须建有 20% 的福利住房。（4）设立“普遍医疗保障”制度。从 2000 年 1 月 1 日起，法国开始实行“普遍医疗保障”制度，该制度被认为是法国社会保障的一项重要改革，是社会的一个重要进步，是对“最低生活保障线”（RMI）的重要改进。其基本内容是，在法国本土和海外省居住连续三个月以上、没有达到规定的“收入底限”的所有领薪者都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待遇。二、**原有一些补贴项目的标准上调。**（1）失业金领取资格下调，分摊金降低。（2）五个特种补助津贴从 2001 年 1 月起上调 2.2%。（3）“安置津贴”和“特别救助津贴”从 2001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上调。（4）“法定最低工资”的标准上调 3.2%。法国政府于 2000 年 6 月 30 又上调了“法定最低工资”（SMIC）标准，即由原来的毛工资 40.72 法郎/小时上调至 42.02 法郎/小时。按每月 169 有效工时计算，每月的“法定最低工资”税前为 7101.38 法郎，税后为 5609.38 法郎。

⁵ http://www.insee.fr/fr/ffc/Liste_theme.asp?theme_id=4&first_doc=1
<http://afp.liberation.com/afp/fra/010303182524.n9incr91.html>

⁶ <http://www.cnis.fr/frame.htm>

⁷ <http://www.afp.com/francais/products/?pid=online/journaieur>

⁸ 奥斯卡尔·拉冯塔纳作为民主党和绿党联合政府中的财政部长于 1998 年就职，次年 3 月辞职，原因是他试图运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结果遭到了德国企业界的持续抨击。他认为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从意大利的普罗笛政府到法国的诺斯潘政府，都把货币政策转交给欧洲中央银行，结果束缚了自己的手脚，难以推动有利于各自国家劳工利益的变革。参见舒尔茨，B·H。（2001）。

⁹ 在这方面，柳永明作了专门的研究，请参见《开放经济与欧洲的紧缩性经济政策》，载于《世界经济》，2001 年 3 月，第 21 - 28 页。

¹⁰ 关于欧洲国家福利外化的独特现象，周弘做了赋有成效的研究，请见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3 期。

¹¹ 例如对国际资本流动和航空旅行进行征税，税率宁可低一些，据 UNDP 的估计其数额可以在全球 GDP 的 3% 以下。这部分内容请参见国际劳工局·日内瓦（2001），第 45-46 页。

主要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2000）：《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

2，奥利维耶·施瓦茨（2001）：《工人阶级变成了什么？》，载于法国《人道报》，5月2日。

-
- 3, 比德·泰勒 (2001) : 《日益衰退的工会进入忧虑忡忡的时代》, 载于英国《金融时报》, 3月9日。
- 4, 国际劳工局·日内瓦 (2001) : 《2000年世界劳动报告: 变化世界中的收入保障和社会保护》,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 5, 姜列青 (2001) : 《俄罗斯工会人士谈当今世界上的几类社会模式及其工会》, 载于《国外理论动态》, 第3期。
- 6, 《劳工世界》(2001),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第8期。
- 7, 米歇尔·阿尔贝尔 (1999) :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8, 袁元伦 (2000) : 《2001年 - 2005年: 德国的税收改革》, 载于《中国改革报》, 9月20日, 第8版。
- 9, 斯密特, 哥诺特 (1998) : 《法团主义的命运: 过去、现在和将来》, 载于张静: 《法团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0, 舒尔茨, B·H. (2001), 《全球化、统一与德国福利国家》, 载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2001年2月, 第18-1期。
- 11, 周弘 (2001) : 《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 第3期。
- 12, 郑秉文: (1), 《一年来欧洲主要国家福利改革新动向》, 载于《人民论坛》(人民日报社理论部主办), 2001年第8期。(2), 《一年来欧洲主要国家福利改革新动向综述(上)》, 载于《中国经贸导刊》, 2001年, 第17期, 第41-42页。(3), 《一年来欧洲主要国家福利改革新动向综述(下)》, 载于《中国经贸导刊》, 2001年, 第18期, 第41-43页。(4), 《法国社会保障改革的新动向——不断增加福利项目, 大幅提高福利标准》, 载于《中国社会保障》, 2000年第12期。(5), 《欧洲国家福利改革新动向》, 载于《经济日报》, 2001年8月20日, 第7版。
- 11, Garrett, G. (1998), *Partisan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2, Hutton, W. (1995), *The State We're In*, London, Jonathan Cape.
- 13, King, D.S. (1987), *The New Right*, London Macmillan.
- 14, Ramish Mishra, (1990), *The Welfar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Harvester Wheatsheaf.
- 16, Tabb, William A. (1989), *Labour and Imperialism of Finance*, Monthly Review, Vol.41, No.5, October.